◎文学新地理(15)

河北文学：现实主义的坚守及新变

郭宝亮

●河北文学的底色是现实主义，诗歌、散文与报告文学都取得成就

●河北文学的重要成就还是在小说创作领域。小说创作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又融汇创新的发展路径

关仁山

胡学文

李春雷

刘建东

李　浩

张　楚

河北是文学大省，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十七年时期，除了从解放区走来的诗人田间、远千里、曼晴、刘艺亭等继续创作了大量优秀诗歌外，还涌现出了刘章、何理、浪波、尧山壁、戴砚田等优秀的乡土诗人；新时期以来，张学梦、边国政、姚振涵、刘小放、曹增书、伊蕾、陈超、郁葱、大解、刘向东、杨松霖、刘松林、何香久、简明、白德成、萧振荣、韩文戈、李南、东篱、李寒、北野、见君、李洁夫、宋峻梁、石英杰、孟醒石、胡茗茗、施施然、青小衣等都以他们的诗作活跃在诗坛上，都曾产生重要影响。河北的散文与报告文学也异常活跃，十七年时期就有方纪的《挥手之间》、房树民等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兄弟》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新时期以来，老作家孙犁、徐光耀等专事散文创作，成就卓著。孙犁《亡人逸事》《黄鹂》等散文作品，在平淡自然中蕴含着悠远的意味。徐光耀的长篇散文《昨夜西风凋碧树》笔力雄健，境界阔达。铁凝、梅洁、张立勤、韩羽、郭秋良、刘家科、刘江斌、桑麻、张丽钧、雪小禅等的散文都曾产生过全国性影响。报告文学创作发展迅猛，涌现了李春雷、一合、梅洁、王立新等作家，他们的作品《黑脸》《宝山》《朋友》《创世纪情愫——来自中国西部女童教育的报告》等，题材重大，影响广泛。

当然，河北文学的重要成就还是在小说创作领域。而小说创作也十分鲜明地体现了河北文学坚守现实主义创作特色而又融汇创新的发展路径。十七年时期，河北小说上承解放区文学传统，在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生活题材两个领域取得了重要实绩。前者如梁斌的《红旗谱》，孔厥、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孙犁的《风云初记》，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冯志的《敌后武工队》，雪克的《战斗的青春》，刘流的《烈火金钢》，徐光耀的《小兵张嘎》《平原烈火》等，都曾产生重要影响。后者如孙犁及其影响下的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等“荷花淀派”的创作，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道靓丽风景。孙犁创作于1956年的《铁木前传》，是十七年时期少有的最优秀的小说之一。而孙犁影响下的“荷花淀派”是十七年时期最重要的也是最有特色的创作流派之一，为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直到新时期，铁凝、贾平凹、莫言等优秀青年作家均受到孙犁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铁凝成为河北文学的一面旗帜。她的创作始终与时代共呼吸，既继承坚守着现实主义的精神，又不断地创新发展，成为河北文学继往开来，走向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一种风向标。“香雪”时期的铁凝以“香雪般善良的眼睛”在细微处寻找真善美，在日常生活中讴歌理想。善良、美好、温馨构成铁凝早期创作的基调，细腻、恬静、雅致构成铁凝这一时期创作的基本风格。“玫瑰门”时期的铁凝一改那种单纯地在生活中寻找真善美的冲动，而是深入生活的细部，深入人物复杂的内心，试图全方位、复杂地表现生活，加强了对生活混沌的展示。《玫瑰门》中塑造的司猗纹是中国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形象之一。2000年推出的长篇小说《大浴女》，实现了她所追求的“复杂的单纯”的艺术境界。2006年出版的长篇小说《笨花》，是她走向艺术综合阶段的集大成之作。对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坚守，是这部作品的基本主题之一。

除了铁凝之外，新时期河北小说创作队伍主要由三个梯队构成。第一个梯队是出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一些作家，他们与共和国一同成长，经历了五六十年代以及“文革”，因此当历史进入新时期，他们站在了文学复兴的前哨。他们是贾大山、汤吉夫、陈冲、张竣、潮清、申跃中、奚青、关汝松等。贾大山在1977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取经》获得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他后来以《梦庄记事》为总题的一组小说，以“我”的知青生活为题材，以亲历者的身份讲述经过时间沉淀的梦庄人的一个个往事，其中蕴含了作者对人生、人性的深层思考。他的“古城人物”系列小说，更加注重向历史深处开掘，作品更具文化意蕴。陈冲的小说一直把城市工业企业的改革作为题材的重点，直面现实，在正面讴歌改革生活的同时，又不回避现实中的矛盾，常常从一个侧面来反映时代前进的步伐，又敏锐地写出了改革过程中各种人物的精神世界及其嬗变，并由此形成了他小说艺术的特色。

河北新时期文坛的第二个梯队是出生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批作家。主要有关仁山、何申、谈歌、何玉茹、阿宁、宋聚峰、贾兴安、于卓、康志刚、丁庆中、水土、赵云江、李延青、周喜俊等。被称为“三驾马车”的何申、谈歌、关仁山成名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他们的小说直面现实，关注国有企业与乡镇的困境，表现改革进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在当代文坛掀起了一场“现实主义的冲击波”。关仁山早期以雪莲湾小说系列而引起文坛注目，作品主要反映出从传统到现代社会转换过程中正义伦理的混乱。随后，他的聚焦点从海湾风情转向平原，渐渐把主要精力转向长篇小说创作。他的《天高地厚》《麦河》《日头》《金谷银山》等小说，聚焦乡村的新的变化，关注新型农民的生存现实，《金谷银山》曾被称为是新时代的一部“创业史”。何申在温和的叙述中，包含着他对人性、道德伦理认真深入的思考，长篇小说《多彩的乡村》曾博得广泛好评。谈歌的小说，通过对转型期工厂生活的具体记述，如实地反映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过程中正义原则失效、正义意识淡薄、正义实践不良的伦理现实。长篇小说《家园笔记》形式新颖，风格彪悍。何玉茹的小说往往喜欢从小事入手，善于写小人物的内心活动，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叙事中表现出一种对人的存在状态的关注。

河北新时期小说创作第三梯队是一批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80年代的年轻作家，主要有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刘荣书、曹明霞、刘燕燕、王秀云、讴阳北方、唐慧琴、常聪慧、梅驿、清寒、王霜、徐广慧、左马右各、杨守知、张敦、孟昭旺、夜子、左小词、闵芝萍等。

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被称为“河北四侠”，这主要是从他们的创作姿态上来考量的。正是“河北四侠”将先锋小说的写作因素与河北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结合起来，使得这一传统具有了新的质素。胡学文的小说往往取材于坝上草原底层农牧民的生活，表现他们苦难的生存状态。浓郁的底层生活气息、强烈的爱憎情感、传奇的故事情节和自觉的艺术追求，都使他的小说达到了一定的艺术水准。近年他的小说开始向人性的深处探索，刚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从正午开始的黄昏》，就是这种探索的成果。刘建东的小说明显吸收了先锋小说在文体形式上的优长之处，在语言叙述上都“洋味”十足，这使他的小说在河北这块历来追求本土朴实的现实主义风格的土壤中显得卓尔不群。他的小说观念新潮，手法先锋，视野开阔，但究其内核却是地道的现实主义。《全家福》《一座塔》《阅读与欣赏》《丹麦奶糖》等获得业界好评。李浩的小说往往具有先锋小说的流风余韵，在对历史的形而上关注中又有对现实的反省。代表性作品有《将军的部队》《镜子中的父亲》等，特别是《将军的部队》，把过去那种阴冷的叙述转向了暖色。和平年代的将军显然也是“多余人”，他在晚年对自己“部队”的怀念，不是对战争的追忆，而是对已故战友友情的温馨眷顾。张楚的小说专注于复杂人际关系中个体的境遇和生存姿态，关切市井小人物的挣扎或溺毙，往往在整体的忧郁哀婉中展现细密绵软的暖意。他的小说叙事精巧而气韵灵动，诗意盎然而又烟火气十足，属于典型的诗化现实主义创作。《七根孔雀羽毛》和《夏朗的望远镜》，把忧郁中的温馨，感伤中的坚韧，犹如川端康成般的颓唐的美发挥到极致。他的短篇小说《良宵》写了底层边缘人的孤寂与温暖，斩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也是当之无愧的。

总之，河北文学的底色是现实主义的。几代作家都努力继承并坚守着这一传统；同时他们又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和丰富着这一传统，使现实主义的道路愈来愈广阔。

（作者为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新作评介

三代人岁月峥嵘 百万言情怀澎湃

——梁晓声近作《人世间》简评

张志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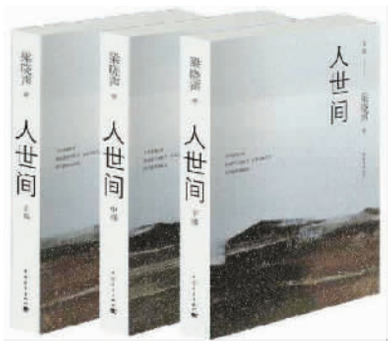
捧读著名作家梁晓声的三卷本百万余言的《人世间》，让我想到了《周易》中的一段话：大人虎变，小人革面，君子豹变。

从《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而瞩目于文坛，梁晓声对理想主义的坚执，就成为其创作的醒目标识，同时也引发了相关的争议，就是如何处理理想主义与现实境遇的关系。

《人世间》仍然是写作家所熟悉的A城，也不乏北大荒知青岁月的片断，但是，它的笔墨更为开阔，年代更为长久，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从A城城乡结合部“光字片”小土屋群落的底层民众，在边远地区支援“大三线建设”的新中国第一代建筑工人周志刚和在邻居中口碑极好的周妻，周家的周秉义、周蓉、周秉昆三兄妹，三兄妹各自的配偶以及他们的下一代楠楠、玥玥、周聪，再加上三兄妹的朋友圈和工作关系，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人物图谱：有中高级干部，有海外留学生，有市井小民，有公安干警，有文化人士，有在市场化时代叱咤风云的商界大枭，也有更多的下岗职工和再就业的员工……林林总总，再加上曾经是共和国长子的东北重工业基地在1990年代以来遭受的时代转型期之痛，以及A城特有的日俄历史文化遗迹与异域特色，强烈的地域性色彩，给作品增添了别样风情。

周家三兄妹和他们的工人父亲，很容易让我联想到欧阳山《三家巷》中同样是居于社会底层的热血青年周家兄妹。青年人与时代的交汇与冲突，到周秉昆三兄妹这里同样不能幸免，周秉昆三兄妹的人生道路也同样充满了山重水复千回百转，但是，在被拉长长达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们的人生却有了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深长意味，他们对种种人生况味的体验与反省，恰恰是周炳们还来不及进行的。周秉昆三兄妹所经历的，恰好是知青一代人从青春岁月走向社会到逐渐淡出历史舞台的漫长人生，也是梁晓声自己生命成长中最为重要的半个世纪；与此同时，这也是当代中国历史大转型的50年，是风云跌宕柳暗花明的伟大时代。人的一生，是一个成长和成熟的过程，在不同的时段需要面对不同的人生课题，如孔子所言，20而冠，30而立，40而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作家自身和他笔下的人物，经历了半个世纪的风云起伏世事沧桑，与伟大的变革时代一起成长。就时代而言，它所完成的，一是走出以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为社会主导的推进器，转向以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为中心的大转换，二是从僵化、保守的计划经济向活跃多变的市场经济的大转换。这样的时代，不但是步入政坛、身为中高级干部的周秉义，英姿勃发的年轻副教授周蓉们大有作为的时代，也给身为普通工人的周秉义带来各种机遇，遭逢各种波折，使得作品在政治、经济、文化、普通市民生活的不同层面上得以纵横交叉地展开，在时代进程与普通人命运的关节点上用力气，在周家兄妹及其朋友们的一次次春节聚会上做文章，由小见大地窥测出大时代的匆匆踪影。

作品的中心人物周秉昆，是周家的“老疙瘩”，在学习和工作都颇为出色的兄长周秉义和姐姐周蓉的比照下，他显得那么无所作为；连他留城工作的机会都是在哥哥姐姐相继下乡当知青而留给他的。他唯一一次人生大放光彩受到他人影响参加1976年清明前后悼念周恩来总理、抗议“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斗争，为此付出被捕入狱的沉重代价，其后尚未得到正式平反，就调入新曲艺编辑部，在1980年代前半期感受到个人际遇与时代精神的贴合。但是，在其人生经历中，又有许多次不由自主地卷入到种种暧昧或者尴尬的意外事件中。他的那些朋友，则是一直在社会底层打拼了大半辈子，始终都处于社会边缘，经常处于需要救助的状态。正是在这一个个人生的重要关坎上，周秉昆的人性光辉不经意地显现出来。如前所述，褪除了青春时代凌虚高蹈的理想之光，选取周秉昆这样一个鲜活的普通人为主人公，



梁晓声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梁晓声的艺术选择，有了新的气象。周秉昆的性格特征可以用“义”加以表述。这其中，有来自社会底层相濡以沫相嘘以湿的义气，有孔孟之道仁义为首的文化传承，也有来自雨果《悲惨世界》等文学名著中博大胸怀的影响。如何给自己一个合适的社会定位，如何在自己的生存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去援手他人，对于周秉昆常常是一个考验。非常难得的是，这个曾经被父母双亲和哥哥姐姐都不看在眼里的小儿子，却在每一个重要场合都体现出他对朋友对他人的关爱和扶助。他的担当和豁达，都非常人可比。

周秉昆的“义”，是融合了各种文化要素的，这和许多作家在批判道德崩溃时竭力诉诸底层民众的道德优势是有所区别的。

周家兄妹在这个大时代，都曾经得到过施展自己的才华的舞台。人们在这百世难逢的大时代中摸索前行，然后又有足够长的时间去展现自己，有足够长的时间回望既往反思人生，在这样的人生长旅中获得情感的积蓄与释放，得到智慧的滋生与人性的涵养，活出了自我，活出了精气神。

◎作家谈

『好玩』的背后

范小青

有点奇怪。

我自己知道，年轻时候的我，不是十分的“好玩”。

除了偶然有机会在酒桌上表现一点装疯卖傻，平时更多时候，就是个一本正经写作的人，也说不出好玩的话，也做不出好玩的事，内心也不觉得“好玩”有多好玩。

就这样，一个不好玩的我，写着写着，年纪就渐渐地大了，又渐渐地老了，十分出乎意料，伴随着年岁一起来的，不是成熟，不是矜持，不是拿捏，竟然是“好玩”。

这个“好玩”更多是说的内心世界，不一定是真正的实际行动。因为从实际行动来说，我仍然是喜静不喜动，不旅游，不逛街，我仍然一个人待着多长日子也不会觉得郁闷。

但是一个人的内心的力量，难道不也是一种很厉害的力量么？

一个天天在外面游山玩水的人，也不一定就是一个“好玩”的人呀。一个哑巴了或者瘫痪了的人，也许会是一个“好玩”的人呢。当然也可能正相反。那是涉及灵魂而不是涉及肉体的事。

我如果一直一个人呆坐，岂不等于是哑巴和瘫子吗？但是每天每天，我的内心都会翻跟斗，十分好玩。

我觉得自己简直有点老不正经，就像《灭籍记》的那个郑见桃，我一直感觉那就是我自己，我在写她种种“好玩”的时候，好几次笑得哈哈哈哈，眼泪都掉下来了，擦也擦不干。

也许是这种贪“玩”的心态，直接影响了我的写作。

先自我反省一下，这种心态是怎么演变、怎么发展来的呢？

这就要说到世界、说到生活、说到我们所处的时代了。我曾经在2016年的某段时间，几乎在同一天里，接受到三条内容，一是诺贝尔文学奖给了美国摇滚歌手鲍勃迪伦（接下来假新闻不断、真假新闻混淆）；第二是希拉里和特朗普的同台演讲被恶搞成情歌对唱，还是粤语版的呵呵（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三是我们记忆中印象非常深的地道战中鬼子进村了那段音乐，原来是俄罗斯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乐中的片段（至今不知真假）。

世界变得很有趣，变得奇怪，无厘头，好玩，但绝对不是简单的傻傻笑那种好玩，是暗含着错综复杂内容的不可捉摸的有趣，是有着特殊分量的奇怪，是让人感叹的沉重的好玩。

在这样一个时代写作，写的又是时代的故事，我们已经无法用从前的一本正经的老眼光、老观念去看待、去提升，我觉得自己已经“回不去”，回不到一本正经的状态，已经无法不追求“好玩”了。

所以，这样看起来，也许是我的写作让一个不好玩的人，在老了的时候，变得“好玩”了。这和刚才我所说的“这种贪‘玩’的心态，直接影响了我的写作”这句话，恰好关系倒置。

关系的倒置，真假的难辨，观念的对峙，一地的鸡毛，满脑子的混乱，组合成了时代的风貌，世界在变化，文学怎么样？至少我想，我们的写作可以有、也应该有更多的路径。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是我的小说，就是写好玩的故事，然后在“好玩”的背后，埋伏很多东西，或者说，在“好玩”的背后，天生就埋伏着很多东西。至于这些东西，读者能不能读出来，那就要看我们的缘分了。

卡尔维诺有一个短篇小说，写一家人逛超市，所有人都尽情地欢快地挑选自己喜欢的东西和家里需要的物品，堆放了满满一推车，当然，最后他们必然是要把这些东西一一地放回原处的，因为他们身上根本就没有钱。但是小说的结尾出现了意外，超市的管理出了事故，使得他们意外地带走了货物。

这个意外是轻逸的，好玩的，但却是更沉重、更痛的。

再说说《灭籍记》中的“好玩”的人物：郑见桃。一个必须冒名顶替才能生存下去的老太太。年轻的时候为了追求真理和爱情，丢失了身份，一辈子都无法做回自己。在从前，做回自己就要被治罪，到后来，做回自己就会被饿死。这个人的遭遇忒悲惨了，可是因为她在人生的最后一程，冒名了一个有钱的老太太，所以她活得姿意自在，爱吃吃，爱喝喝，想骗人就骗人，爱捉弄人就捉弄人，谁也不敢惹她，一个好玩的老不正经的老太，自以为足智多谋，无往不胜，可她的人生到底是赢家还是输家呢？她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听到过郑见桃这个名字了？所以，这个活得姿意自在自以为好玩的老太太，真的是郑见桃吗？

好玩的故事承载历史的命运，“好玩”的背后，是对现实的剖析和生存的思考。这是我想做的事情。

范小青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